



古汉语研究 2018 年第 4 期(总第 121 期)

# 汉语历史语法的“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

唐贤清 姜礼立 王巧明

(湖南师范大学 南方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汉语历史语法的“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立足于汉语语法结构的历史演变,利用现代汉语共同语、现代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和境外语言的研究材料和理论方法来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服务。本文拟从研究思路、研究价值和研究难点三个方面尝试对汉语历史语法的“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进行探讨。

**[关键词]** 汉语历史语法; 普方古民外;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H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442(2018)04-0043-7

上世纪九十年代始,邢福义(1990)提出了“普方古”大三角理论,形成了对现代汉语语法的立体研究思路。三十余年来,学界又引进了诸多的国外语法理论来研究汉语语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有研究,利用历史文献材料来为现代汉语共同语、现代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研究服务的成果较多,但是利用现代汉语共同语、现代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和境外语言来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服务的成果则较少。本文立足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提出了服务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

汉语历史语法的“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立足于汉语语法结构的历史演变,利用现代汉语共同语、现代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和境外语言的研究材料和理论方法来解决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的问题,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拓宽研究领域,形成“三结合”,即把历史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语言接触理论、比较语言学、区域语言学、区域类型学等相关理论结合起来,把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把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助推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发展。

## 一 汉语历史语法“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的研究思路

### (一)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与现代汉语方言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可以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提供佐证材料,为某些汉语历史语法现象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存在两种材料缺乏的情况:

一是某一语法现象在历史语料中曾经大量存在,但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已经消失,这就会造成“下不联今”的假象,从而给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带来困惑。

一般认为汉语是 SVO 型语言,但古汉语存在一种否定词宾语前置结构,如“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吾未之闻也”等。这种结构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已经消失,从现代汉语来看,这是一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湘与黔桂边跨方言跨语言句法语义比较研究”(编号:15ZDB105)。





种特殊结构,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就出现了“倒装”“易位”“移位”等多种解释,甚至有教材认为它“不符合人们思维、逻辑的顺序”“这种句式属于书面语,不是当时老百姓的口语”。杨伯峻(2001)统计了《左传》中否定词宾语前置的情况,前置约占68%,后置约占32%,从数量上看,否定词宾语前置是古汉语的一种优势语序,是合理正常的。但所用材料是文字材料,仍无法回应“不是口语”的质疑。汉语方言与古汉语一脉相承,如果方言口语里存在这种语序,则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证据来回应这种质疑。现代闽方言中就活跃着这种语序,如:<sup>①</sup>

(1)A: 我今日未看查亩仔。我今天要探视女儿。

B: 汝坏查亩,合别人走,我查亩仔不汝看。你是坏女人,跟别人跑,我不让你探视女儿。(黄聪聪, 2009)

(2) 福建东山话: 汝怀付钱,我厝不汝住。你不给钱,我不让你住这房子。

(3) 福建石狮话: 伊不洗身,汝衫不伊乘。他不洗澡,你别给他穿这衣服。

闽方言否定词宾语前置结构“查亩仔不汝看”“厝不汝住”“衫不伊乘”与古汉语的“岁不我与”“吾未之闻”出现的句法环境有所不同,前者一般出现在致使句中,而后者则不具有致使义。但是二者在语序上具有相似性,这至少从形式上可以说明口语中存在这种语序。但古汉语材料是书面语料,我们无从分析说话人使用这种句式的语感、语用目的和认知机制。鲜活的方言口语材料则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方便。黄聪聪(2009)通过对闽方言宾语前置现象的探讨,认为古汉语和闽方言的这种语序反映了人们认知和思维的相似性:都与说话人急于把自己要表达的信息、事物、观点传递给对方有关。

二是某一语法现象虽然在历史语料中存在,但是用例很少,有些甚至是孤例。我们知道,虽然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成果宏丰,但自觉的语法研究成果很少,很多汉语历史语法现象是靠自然语料来记录的,而不是用语法专著来记录的。自然语料对语法现象的记录具有真实可靠的优点,但也存在不系统和不全面的缺点,难免造成有些语法现象语料丰富,有些语法现象语料极少的不均衡局面。语言学界历来信奉“例不十,法不立”的原则,研究者往往对这些出现次数少的用例不敢加以利用,甚至怀疑这些用例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如果这些用例在汉语方言中大量存在,则可大大提高其可信度和使用价值。

关于近代汉语复数词尾标记“们”的来源,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其中比较主要的说法有三种:“辈”字说、“门”字说、“物”字说。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导致论证不够,缺乏直接有力的确证。江蓝生(2018)从多种语音演变途径和现代汉语方言的直接证据两方面对“们”源于“物”的旧说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修正。“们”源于“物”说由于在历史文献资料中没有找到直接有力的证据,虽然这一判定有其理据,但是很难从假说成为定论。江蓝生先生通过考察江西安福话、陕西关中方言、甘肃唐汪话、闽语建瓯话、闽语顺昌洋口话、甘肃甘沟话以及晋北、陕北等西北方言的复数词尾标记,发现在部分汉语方言中存在复数词尾标记“们”源于“物”的直接而有利的证据,使这一具有争议性的汉语历史语法问题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解释。

## (二)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与民族语言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还需要有民族语言视角。汉语有为数众多的亲属语言,汉藏语系语言约占我国语言总数的一半以上<sup>②</sup>。许多与汉语具有亲属关系的民族语言中,至今仍然保留了不少古代汉语的语法形式。戴庆厦(2008)曾指出古汉语中出现过的“田十田”“牛十牛”等反响型量词,在现代的哈尼语、载瓦语里还大量出现。古汉语曾经有过的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这一语法







形式,在藏缅语许多语言中如景颇语、载瓦语、独龙语等仍然使用。汉语与其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使得民族语言能为汉语的历史研究提供大量的、有价值的线索和旁证,也能为构拟原始汉藏语和揭示汉藏语历史演变规律提供证据。

例如上古汉语甲骨文、金文“A+数+A”格式(如“羌百羌、人十又六人、乘一十又七乘”)中居后的“A”的语法属性的判定,学界有过争议。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与相关研究仅在汉语内部窥探“A”的语法属性,没有从类型学视角将汉语与亲属语言相比较有一定联系。而蒋颖(2005)将汉语与藏缅语如哈尼语、纳西语、藏语、景颇语、独龙语、阿昌语等进行比较,认为上古汉语甲骨文、金文“A+数+A”格式中居后的“A”应该是反响型量词。因为汉语和藏缅语的反响型量词在得以产生的有利语序(“名+数+量”)、专用粘着性、不表义以及未达到重新分析的发展阶段等方面具有类型学共性。而汉语反响型量词产生的时间早,但使用时间却不长,数目较少,藏缅语许多语言的反响型量词恰巧相反,至今仍在频繁使用。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也与二者的反响型量词在语序、句法关系、语音形式等方面的差异有关。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融合程度高,语言接触频繁。汉语与民族语言在长期的接触中,互相借鉴和吸收了对方很多语言成分,古汉语中的一些语法成分和特点至今仍保留在许多民族语言历史文献中。我们通过参照民族语言,可以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提供有力的证据和更加合理的解释。

### (三)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与境外语言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除了要具有汉语方言学、民族语言学视角,还应该关注境外其他语言的相关语法现象。通过观察境外其他语言的相关语法现象,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单一语言内部的某一语法现象,还可以使我们对这些语法现象做出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吴福祥(2003)指出,人类语言之所以会存在大量的普遍语法特征,原因在于这些语言具有某些相同的语法演变模式,而语法演变模式的类同本质上是因为具有相似的语法演变机制和认知语用动因。因此在考察某个特定语言的语法演变时,如果能够将单个语言的语法演变放到人类语言演变的背景下来考察,我们对它的演变模式、机制和动因就会有更本质的把握和更深入的解释。

例如汉语史中陈述句句末“也”有静态和动态两种用法,汉语学界对这两种用法的关系有两种说法:一是“记音说”,认为后者是“矣”或其他语气词的记音;一是“扩展说”,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功能扩展。陈前瑞(2008)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参考体貌类型学的相关研究,发现境外其他语言中的体貌标记存在“类助动词>结果体>先时体或完成体>过去时或完整体”的语法化路径,比如英语中类似于结果体的意义是由“be+ed”构成,如“He is gone”,表示状态还存在(他此刻不在这里),“have+ed”构成的完成体则是从“be+ed”构成的结果体发展而来的(Bybee et al., 1994:63)。而汉语史中陈述句句末“也”的典型用法为判断用法,与英语“be”的词源意义非常接近。陈文认为汉语史句末静态“也”也表示状态,属于广义的结果体,是由判断用法发展而来;而动态“也”大部分用法属于完成体,则是静态“也”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汉语史句末“也”的语法化路径正好符合上述的语法化链,这充分阐释了句法“也”由静态功能向动态功能的扩展路径。由此可以看出,在历史语法研究中运用类型学视角,通过比较境外其他语言的相关语法现象,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汉语语法史中的疑难问题,还可以为语言类型学提供实证,验证类型学研究得出的共性或规律。

汉语历史语法与现代汉语共同语的比较研究,属于典型的古今演变的范畴,这里不再阐述。



## 二 汉语历史语法“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的价值

### (一) 对“普方古”大三角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是在邢福义先生“普方古”大三角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普方古”大三角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普方古”大三角理论中普通话是基角,方言和古代汉语对“普”角起着外证的作用,即“以方证普”“以古证今”,形成对现代汉语语法的立体研究思路(邓天玉,2014)。而“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则是以汉语语法结构的历史演变为基角,利用现代汉语共同语、现代汉语方言、民族语言以及境外语言的研究材料、理论方法来对汉语历史语法进行全方位的立体的研究。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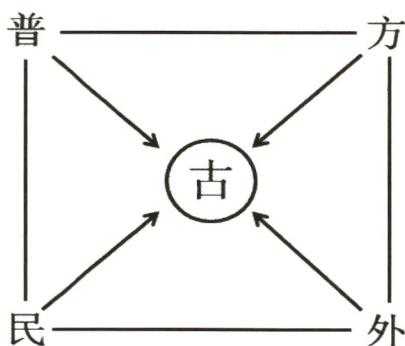


图1 “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示意图

江蓝生(2018)指出考察语言演变的历史,包括考证一些语法成分的来源,不得不利用历史文献数据。但是历史文献资料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们多数是零星的、不连贯不完整的,有的甚至是被扭曲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溯源求本,就要从现代汉语方言中去找线索、找旁证,通过方言比较寻绎古今语言演变的轨迹。

我们在研究古汉语程度副词“伤”时,考察了大量的材料,发现“伤”作程度副词的用例不多,其中还有不少的用例可作动词和程度副词两解。而且程度副词“伤”几乎只修饰形容词,很少修饰其他词类和短语。如:

(4) 过此以往则伤苦;日数少者,豉白而用费;唯合熟,自然香美矣。(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八)

(5) 柳讶眉伤浅,桃猜粉太轻。年华有情状,吾岂怯平生。(李商隐《俳谐》诗)

(6) 今人读书伤快,须是熟方得。(朱熹《朱子语类·论语一》)

“伤”用作程度副词《齐民要术》共24例,《朱子语类》共13例,均全部修饰形容词。南宋以后,“伤”作程度副词的用例在共同语文献中就很难找到了,到现代汉语共同语里,“伤”已不再作程度副词。这就给我们研究“伤”的语义演变带来了困难。通过检索和调查,我们发现“伤”作程度副词在中原官话、赣语、闽语、粤语、苗族“人话”里存在大量用例,如:

(7) 中原官话(山西万荣话):你伤相信他了,不要被他骗了。你太相信他了,不要被他骗了。

(8) 闽语(福建泉州话):汝阿妈伤忝汝喽。你奶奶太疼你了。(许亚冷,2010)

(9) 赣语(江西樟树话):你刚做伤欺负人哩。你这么做大欺负人了。

(10) 粤语(广西容县话):你行伤快咧,等等我。你走太快了,等等我。

苗族“人话”:

(11) 龙胜伟江:咯个人额头伤简单很哇。这个人头脑太简单了。





(12) 资源车田：你伤行快□ tie, 我跟不到。你走得太快了, 我跟不上。

(13) 城步五团：伊坐咧伤背底呱, 望不到。他坐得太后面了, 看不见。

(14) 城步兰蓉：伊伤担心伊□ nie<sup>55</sup> □ nie<sup>55</sup> 弟呱, 不眠死。他太担心他的孩子了, 睡不着。

从这些用例我们看到, 程度副词“伤”在现代汉语方言里不仅用例丰富, 可以修饰形容词, 而且也能修饰心理动词、方位词、动词短语等, 搭配功能也比较强。这就为我们研究古汉语的程度副词“伤”的语义演变提供线索和旁证。

同理, 现代汉语共同语、民族语言以及境外语言的研究材料与理论方法也可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提供参照与证据。现代汉语共同语、现代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和境外语言对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作用受语法结构的类别制约, 比如句法结构是比较普遍的语言现象, 一般语言中都有主谓、动宾、定中、状中、并列结构(刘丹青, 2011), 所以在探讨某一句法结构的历史演变时, 现代汉语共同语、现代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和境外语言均可以提供线索和证据, 而在探讨量词的历史演变时, 相比句法结构的演变能够参照的语言或方言要受限的多, 因为量词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语言区域中, 世界大多数语言量词不显赫, 且该语言区域内部的语言、方言之间量词的显赫度也存在差异, 如藏缅语的量词一般不显赫, 而壮侗语族、苗瑶语族以及汉语南方方言的量词则比较显赫。世界语言量词的不均衡分布自然而然会制约各种语言、方言对量词历史演变研究的作用。

## (二) 打破“单一语种”研究模式, 提倡跨方言跨语言的类型学研究范式

现在语言学界的倾向或者是新的标准是: 哪怕是个别语言或方言的研究, 也要考虑共性和类型, 更进一步考虑对语言理论的贡献。这无疑提高了研究的难度, 但同时也提升了研究的水准。以往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多是集中对汉语历史文献资料进行考察, 很少将其置于历时类型学视角下进行探讨。如此就会产生两大弊端: 一是只局限于汉语史内部寻绎某一语法现象的演变轨迹及动因, 如果汉语历史文献资料不充足, 就会造成论证不够, 从而判断错误; 二是无法确定哪些语法演变是汉语的特性, 哪些是世界语言普遍出现的演变模式, 不利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深入。吴福祥(2005)指出在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借鉴历时类型学的理论、方法,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判定哪种演变方式更为可能, 还可以帮我们检验我们对语法演变的解释是否合理。比如上古汉语的“及、与”, 中古汉语的“将、共”, 近代汉语的“和、跟、同”, 吴语的“搭、帮”, 闽语的“合”等, 这些在汉语的不同历史阶段以及汉语不同的方言里都出现了同一个语素既可以用作伴随介词又可以用作并列连词的现象。以往学界对于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之间的演变方向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即“伴随介词>并列连词”和“并列连词>伴随介词”。如何判定哪种观点更加科学有据, 不仅要把着眼点放在汉语历史文献上, 还应该开阔视野, 吸取类型学形态句法的研究成果。已有成果表明“伴随介词>并列连词”是 SVO 语言中一种普遍常见的演变模式, 而“并列连词>伴随介词”的演变模式在迄今已知的人类语言形态句法演变中却未被证实。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汉语中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之间的演变方向应该是“伴随介词>并列连词”, 而非相反。如此可见, 类型学的方法和成果对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 (三) 为历时类型学研究提供参考, 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

“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的引入, 突破了汉语史的框架束缚, 将汉语语法现象的演变置于世界语言普遍语法演变模式的范围内考察, 不仅能够有助于我们拓宽研究视角, 加深对世界语言普遍语法演变模式的认知, 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的探讨汉语语法现象演变的轨迹, 进而区分哪些语法演变是汉语的特性, 哪些是世界语言普遍出现的语法演变模式。同时也能够为历







时类型学研究提供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实证,从而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增强我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学术话语体系。完成体到最近将来时这一语义演变路径是类型学上极为罕见的语法现象,在波斯语、新阿拉米语(Neo-Aramaic)、印度尼西亚中部苏拉威西岛的语言 Pendau 等极少数语言中发现有此类语义演变模式。而陈前瑞(2012)参照类型学的演变模式,考察汉语历史文献和汉语方言材料发现从完成体向最近将来时方向演变,是汉语通用语和汉语方言时体将来时演变的常见现象,如现代汉语的句尾“了”、近代汉语的“去”和“也”、吴语汤溪话“得”等。汉语通用语和汉语方言中的这种常见的时体演变模式,不仅可以为完成体到最近将来时这一类型学罕见形态句法现象提供佐证,验证其正确性,还能够将汉语通用语及其方言纳入到类型学考察的语言样本中,从而有效提升我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 三 “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的难点

(一)句法语义演变的识别和判定难度大。一个语言中特定的句法语义演变,既有可能是该语言本身内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有可能是语言接触导致的产物。语言独立发生的句法语义演变和语言接触引发的句法语义演变在很多方面并无二致,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一个特定的句法语义演变,我们常常并不容易判定它是语言接触引发的,还是该语言内部因素导致的。比如汉语方言虽与古汉语一脉相承,但方言分化的历史久远,相同的语法现象是方言对古汉语的继承,还是分化以后方言独立发展的结果,难以判定。同样,我国境内的民族语言,特别是汉藏语系语言,与汉语有着共同的原始祖语,历史上又有过长期而密切的接触,共同的语法现象是继承自共同的祖语,还是接触的影响造成的,也很难分辨。而且部分民族语言的系属并不明确,更加大了判定的难度,如果不是同一祖语,则还有可能是类型学上的相似性。例如中古译经中“亦”并列连词用法的来源,学界就有不同看法。许理和(1987)、龙国富(2005)、徐朝红(2012)将其归因于译经者的误用,蒋冀骋(1994)诠释为外来语的影响,张延成(2002)认为是汉语自身的演变,徐朝红、吴福祥(2015)则认为“亦”是类同副词变为并列连词,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接触引发的语义演变<sup>③</sup>。

针对这一难点,我们除了要具有历时类型学视角,把汉语形态句法演变置于世界语言普遍语法演变模式范围内考察,还应该熟悉各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善用排除法,逐一判定。

(二)句法语义演变的共性与差异的解释难度大。语言研究的高层次追求是“解释的充分性”,如何对通过“普方古民外”的立体比较得出的句法语义演变的共性和差异进行充分的解释,尤为困难。例如唐贤清、陈丽(2011)指出汉语方言中保留了古汉语程度补语“煞”的五种用法,但是不同的汉语方言继承了不同的形式,探讨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就非常困难。

要提高这种解释能力,对研究者的理论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从事历史语法研究的学者,不仅要有扎实的历史语法功底,还要抛弃对各种理论流派的成见,兼擅语言接触、比较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区域语言学、区域类型学等学科理论。

(三)语料的收集与甄别难度大。“普方古民外”的立体研究需要大量的语料,但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语料并不丰富,有些语法现象没有材料,或者已有的材料不够精细,这都需要研究者亲自进行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要有较强的语言调查能力。对境外语言材料的收集,则还要求研究者还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要解决这一难题,组建各有特长的研究团队势在必行。

除了材料少外,已有材料的查找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目前,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共同语都有了方便查找的语料库,但是方言和民族语言的语料库建设还相当薄弱,能利用计算机进行智能搜索的材料很少,大多要采用人工检索。在大量材料中对某一语法现象进行人工检索,有时





如大海捞针,费时费力,且收效甚微。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大力加强方言和民族语言语法的语料库建设。

历史语法研究的目标是揭示已有演变的规律、解释共时语言现象以及预测未来演变的方向(吴福祥 2005)。“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的引入不仅有助于我们判断汉语历史语法中相关语法结构的演变方向,帮助我们更加合理地解释某一语法现象产生的根源,而且还可以拓宽我们的研究视角,让我们对世界其他语言的形态句法演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也能够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实证,从而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增强我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语言学工作者责无旁贷。

#### 附注:

①文中所用方言例句,除标明来源外,均为笔者调查所得。发音人信息如下:(福建东山话)黄一修,女,汉族,1994年生,硕士生。(福建石狮话)邱伟东,男,汉族,1995年生,男 大学本科文化。(山西万荣话)谢志忍,男,汉族,1966年生,高中文化。(江西樟树话)饶芳,女,汉族,1995,研究生。(广西容县话),封红羽,女,汉族,1993年生,研究生。以下为苗族“人话”,(龙胜伟江)石生武,男,苗族,1948年生,中专文化;(城步五团)兰支珍,男,苗族,1964年生,大专文化;(城步兰蓉)雷学品,男,苗族,1972年生,大专文化;(资源车田)杨建国,男,苗族,1947年生,中专文化。

②数据来源于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③引自徐朝红、吴福祥 2015《从类同副词到并列连词——中古译经中虚词“亦”的语义演变》,《中国语文》第1期。

#### 参考文献:

- 陈前瑞 2008《句末“也”体貌用法的演变》,《中国语文》第1期。
- 陈前瑞 2012《从完成体到最近将来时——类型学的罕见现象与汉语的常见现象》,《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戴庆厦 2008《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古汉语研究》第4期。
- 邓天玉 2014《邢福义为学路》,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黄聪聪 2009《古汉语语序的合理性新探——以闽南方言为例证》,《南昌大学学报》第5期。
- 江蓝生 2018《再论“们”的语源是“物”》,《中国语文》2018年第3期。
- 蒋颖 2005《论甲骨文、金文的反响型量词——兼与藏缅语比较》,《汉藏语系量词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刘丹青 2011《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当代语言学》第4期。
- 唐贤清、陈丽 2011《程度补语“煞”的历时来源及跨方言考察》,《理论月刊》第2期。
- 吴福祥 2003《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兼论 SVO 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中国语文》第1期。
- 吴福祥 2005《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检讨与反思》,《汉语史学报》第五辑。
- 吴福祥 2005《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目标》,《古汉语研究》第2期。
- 邢福义 1990《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云梦学刊》第1期。
- 许亚冷 2010《泉州方言程度副词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杨伯峻、何乐士 2001《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北京:语文出版社。

【作者简介】唐贤清,男,湖南洞口人,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学研究。邮箱: tangxianqing001@sina.com。

姜礼立,男,河南固县人,湖南师范大学南方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博士,主要从事方言、民族语言语法研究。

王巧明,男,湖南衡南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汉语方言研究。

【责任校对:林子】







suitable for a set of initials. This can explain the traditional deterministic methods that the author Li Deng made notes on the use of *YinyiBiankao* designing only a set of initials, while dividing two categories of Zheng-chi(正齿) and Di-chi(抵齿) in the rhymes of the open-mouth.

**Key Words:** *Shuwenyinyibiankaosibian*(音义便考); unabridged version(全本); *Zhi-zhuang-zhang*(知庄章); sound division and convergence

#### TANG Xian-qing Jiang Li-li Wang Qiao-ming, The Five - Dimensional Research Method in Historical Syntax of Chinese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grammatical structure, the five-dimensional research method in historical syntax of Chinese uses the research materials and theoretical methods of Mandarin, dialect, ancient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to serve the historical syntax of Chines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five-dimensional research method in historical syntax of Chinese from three aspects: research thought, research method and research difficulties

**Key Words:** historical syntax of Chinese; Mandarin-dialect-ancient-Chinese-minority-language -and- foreign-languages; research method

#### DONG Zheng-cun, Study on the Appearance of Construction ‘zui(最)/zai(再)+A+buguo(不过)’ Meaning ‘High Degree’ Based on the View of Constructional Enlargement and Expansio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s of ‘zui(最)+A+buguo(不过)’ and ‘zai(再)+A+buguo(不过)’ are frequently used when they express the meaning of high degree in modern Chinese. And they are formed via appending adverbial modifiers in front of ‘A’ of the construction ‘A+buguo(不过)’ which is already qualitative adjective. The appended adverbial modifier ‘zui’(最) is degree of adverb in nature, and ‘zai(再)’ is modal adverb. The two constructions are synonymou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ir nature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their forming process.

**Key Words:** the meaning of ‘High Degree’; A+buguo(不过); zui(最)+A+buguo(不过); zai(再)+A+buguo(不过); constructional enlargement and expansion(CEE)

#### LI Chun-yang, Study on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the Estimated Adverb ‘KE(可)’ and Its Reasons for Dispelling

**Abstract:** The estimated adverb ‘ke(可)’ is further blurred by the auxiliary verb ‘ke(可)’. It is often used to indicate an estimate of a quantity before the quantity structure. The estimated adverb ‘ke(可)’ has already appeared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has been used in later generations, but it has declined gradually in oral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reasons that led to this development trend are various: the meaning of ‘ke(可)’ is overburdened, and the adverb of estimates ‘ke(可)’ often co-occurs in the use of expression with other estimat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cal Chinese are relatively obvious. Therefore, it would be reasonable to choose a more explicit form of expression in terms of ‘yue(约)/dayue(大约)’ compared with ‘ke(可)’ und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eeking new ideas and differences.

**Key Words:** ke(可); estimated adverb; diachronic development; reasons for dispelling

#### HUANG Zhi-qing HU Fang-fang, The Fragments Conjugated Research on the SiFenLv BiQiu JieBen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Abstract:** *SiFenLv BiQiu JieBen* is a separate edition of regulations for monks of *Dharmagupta-vinaya*. In Tang dynasty, Huaisu compiled this book on the basis of regulations for monks in Chinese version of *Dharmagupta-vinaya*. Through general survey on the published Dunhuang literature, there are 205 pieces of *SiFenLv BiQiu JieBen* manuscripts and many of them were originally the same volume but torn into several piece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sidues of the word, content, writing pattern, calligraphy style and other different angles, 27 pieces of fragments can be conjugated into 12 groups.

